

· 专题：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 ·

大历史观下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 三重内涵与世界贡献

贾玉娇

[摘要] 在大历史观视野下，中国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认知桎梏，立足本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并由此形成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福祉中国作为这一知识体系的实践形态与理论标识，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福利模式与传统保障形态的局限，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民生发展的本质特征。对其理论内涵、制度内涵与实践内涵进行系统凝练和阐释，既能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也能为全球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 大历史观；福祉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知识体系

一、引言

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19 世纪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志性制度安排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制度构成。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带有鲜明的政治体制烙印，政治体制往往因社会保障内涵不同而具有不同特质，进而使得国家具有不同的总体性特征。就西方而言，社会保障作为资本发展逻辑下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制度工具，其发展进程始终受制于资本与劳动的根本矛盾。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在资本扩张、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加剧的多重冲击下，陷入“高福利陷阱”“福利依赖”“制度僵化”的发展困境，其背后是资本主导下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难以调和。^① 与之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立足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与以民生为本的国家社会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民生保障领域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

[作者简介] 贾玉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和制度、社会政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发展型社会政策到共同富裕型社会政策研究”（22&ZD182）。

① 郑功成：《以他国故辙为戒 走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发展新路》，《群言》2023 年第 9 期。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10 亿以上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 亿以上人口，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① 这一系列成就不仅标志着中国已成功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从社会保障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嵌入程度、民生保障与经济协同关系不断提高中，彰显出中国已然具有以民生为本位的国家整体性特征，即呈现出与西方福利国家有着本质区别的福祉中国形态，其内蕴含着内涵丰富的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奋斗中，对“何为社会保障、为谁提供社会保障、如何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关系变革与人的发展”等根本问题的持续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是民生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动实践的总体性理论表征，更是中国顺应人类社会变迁规律、立足自身发展实际而做出的开创性的实践和理论探索。^② 这一知识体系的核心特质之所以具有自主性，是因为其根本依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核心主线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变革，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难题，西方福利国家的制度缺陷日益凸显。在社会共享水平成为度量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文明的重要尺度下，国际社会亟需新的推进社会福祉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基于此，本文以“关系变革”为核心主线，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实践成果及实现这一成果的中国制度保障的总体性特征，系统剖析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内涵，阐释福祉中国的意义，探讨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世界贡献，以为新时代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福祉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二、从大历史观看福祉中国

从大历史观看福祉中国，是站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高度，对人类社会发道路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以民生为本位的国家形态的系统性审视与规律性把握。由此呈现出一条迥异于西方福利国家，植根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本质，以民生实现为核心的国家建构历程与发展道路。基于此，提出一系列具有根本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重大理论问题：福祉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为何？现代化进程中追求民生福祉的制度构建，是否必然遵循西方福利国家路径？中国何以突破西方福利模式的路径依赖，创造福祉中国新形态？福祉中国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又何以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载体？

①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人民出版社，2025 年，第 1-2 页。

② 郑功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论纲》，《社会保障评论》2024 年第 1 期。

这些重大问题深层地蕴含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与人类发展趋向的世界性、人类性命题：现代福利文明所彰显的民生价值追求，是西方语境下的抽象普遍性，还是植根具体历史条件、制度属性与文明特质的具体普遍性？如何把握现代福利文明生成的历史条件与主体实践的辩证关系？如何界定现代福利文明的制度属性，厘清社会主义福祉与资本主义福利的本质分野？如何解读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危机及其背后的西方现代性困境？如何把握福利形态变革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内在关联，探寻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民生发展道路？

提出、探索并回答这些重大问题，需要以大历史观为根本方法，穿透历史表象、把握本质规律，系统揭示福祉中国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与文明内涵；需要立足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维度，阐明福祉中国的历史境遇与实现历程、现实基础与历史使命、创新实践与理论创造、社会理想与世界意义，深度剖析其结构体系、功能价值、发展过程与时代意蕴，从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坐标系中准确定位福祉中国的历史方位，彰显其独特价值与世界意义。^①

（一）从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看中国式现代化与福祉中国

自黑格尔提出“东方从属于西方”命题以来，西方中心论长期主导世界历史阐释，成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认知桎梏。黑格尔将世界史划分为东亚、希腊、罗马、日耳曼四个阶段，将东方文明定位为世界史的停滞开端，将欧洲文明视为历史归宿与发展主导，这一认知构成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源头。^②在此框架下，西方主流理论将中国塑造为现代化“落后”、西方文明“对立面”，构建起支配性话语体系。费正清“冲击-回应”理论将中国近代变革归结为对西方的被动回应，认定创新中心始终在西方。福山“历史的终结”论更将西方制度与资本主义模式奉为人类发展终极形态，把西方中心论推向顶峰。在构建起来的西方发展话语权力之上，福利国家模式成为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开展国家社会建设的参照样板。由此可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是西方通过权力支配、话语塑造、方案输出形成的非自然历史形态，并非具有天然普适性。同时实践证明，盲目模仿西方社会福利举措，会因脱离一国社会性质、历史传统与政治体制而陷入发展困境。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中国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打破西方中心论桎梏提供了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其蕴含的关系分析视角，揭示了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生产力推动社会关系变革的规律，以及发展中资本逻辑束缚人发展的异化关系，^③为民生发展提供理论遵循。以关系变革实现民生发展为政治建设旨归，革命年代打破“三座大山”的阶级压迫，为民生发展奠定政治前提；建设年代变革落后生产关系，为民生改善积累物质基础；改革年代突破僵化体制与失衡利益格局，

① 孙正聿：《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② 《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I分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3页。

③ 贾玉娇：《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2期。

为民生制度建设扫清制度障碍。持续的以关系变革实现民生发展的事实，深刻表明中国民生发展突破西方模式的路径锁定，在摆脱“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境遇的过程中，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二）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创造看福祉中国

大历史观下的福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探索、理论创新的必然成果，是民生发展眼光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成像，亦即是人民至上、民生为本的国家各项制度的总体性表征，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匹配的国家新形态。福祉中国的本质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逐步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集中体现国家意志、政党利益与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作为历史过程与有机系统，福祉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频共振，动态表征持续进行以优化社会关系为个体全面发展扫清障碍的体制改革进程，以通过关系变革实现生存发展条件与内涵向人的本质需要回归。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福祉中国提供根本制度保障、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福祉中国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价值追求。

这一理论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党立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劳动保障体系，完成对旧中国剥削制度下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确立了“国家保障人民、人民共建国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为福祉中国奠定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党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构建市场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民生保障框架，调整政府、市场、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关系，在“共建共享”中激发社会与个体能动性，规避了西方福利国家“单向给付”的弊端。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民生保障从“保基本”向“提品质、促公平、求全面”转型，福祉中国进入系统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在新时代，党的一系列民生战略部署蕴含“个体-家庭-社会-国家”四位一体且良性互动的福祉共建共享共进的思想。在此框架中，福祉是物质、机会、能力与道德发展的综合体，并非是片面的不劳而获或诱发好逸恶劳的温床，而是帮助人民提升美好生活能力、获得治理参与机会、共享发展成果的综合保障，以及在这种保障之下，人能够形成有尊严、有归属、有价值的美好生命关系状态，其核心是通过制度优化实现“赋能型福利”。由此可知，福祉中国的理念突破庇古福利经济学将福祉视为货币效用、以功利主义计算为核心的狭隘认知，破解“重物质轻发展、重个体轻共同体”的片面性；吸收阿马蒂亚·森“功能性活动”与“可行能力”理论的合理内核，摒弃其个体主义倾向，通过共同体框架整合资源、激发个体能动性；批判曼昆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福祉等同于市场交易剩余的资本逻辑，回应蒂特马斯“社会福利是公民权利延伸”的主张，进一步实现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坚守福祉的民生本质与公共属性。

（三）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看中国式现代化与福祉中国

大历史观下的福祉中国，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与重要成果，也是民生视角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体现。福祉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作为植根于不同社会制度、承载不同价值追求的国家体制，存在本质分野却各有历史合理性，这一差异深刻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西方福利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其福利形态受制于资本逻辑，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出发点，其本质是资本逻辑与社会公平诉求博弈妥协的结果。受资本主义阶级属性限制，其福利供给始终服务于资本存续与统治秩序维系，无法突破资本利益的底层逻辑。在运行中，它深受利益集团博弈、政党轮替影响，呈现碎片化与短期化特征，因“资本主导、单向给付”的内在逻辑，极易陷入“福利加码—财政失衡—福利削减”的恶性循环，这一困境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民生保障与人的全面发展上的历史局限。

人类文明演进始终伴随对民生福祉的追求，不同制度与道路孕育不同福利形态。福祉中国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基，形成区别于西方福利文明的独特的实践形态，拓展了人类福利文明的多元发展路径。福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物质精神文明创造与个体发展持续调适、主观能动性与现代性规律深度融合的实践产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将民生保障融入国家治理全过程的具体实践，福祉中国在应对发展挑战、回应人民需求中不断完善。其体制内核以人民至上为根本导向，结构形态呈现社会保障及民生保障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的整体性特征，运行逻辑践行共建共享、赋能发展理念，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性循环。福祉中国建设并非是对西方福利国家历史价值的完全否定，而是在借鉴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突破资本主义制度局限后的中国创新。

（四）大历史观下福祉中国的内涵凝练与价值阐释

福祉中国的核心逻辑贯穿于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三维建设之中，并通过制度结构的持续优化彰显独特体制功能。在国家建设理念上，福祉中国深刻辨析国家与人民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其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根本前提。西方理论多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维护秩序的工具，认定国家与人民在根本上对立；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是现实历史条件下实现人民利益的必要保障。同时必须正视，国家作为具体历史形态，在运行中可能衍生出官僚机构、既得利益群体等阶段性现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展利益关系变革与自我矫治，通过自我革命确保国家权力始终服务于人民福祉。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福祉中国致力于构建内生责任机制与责任伦理的社会共同体，核心是确立社会责任作为更高层次社会权利的基本属性，通过系统性伦理塑造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均衡统一。在个人发展理念上，福祉中国以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参与为核心，旨在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福利国家可能形成的福

利依赖。福祉制度强调脱离发展内涵的福祉异化为束缚人的枷锁。因此，福祉中国通过机会供给与能力补偿，将福祉转化为个体自我发展的阶梯。

从制度结构上看，福祉中国是一种以民生为本位的国家体制表达，其核心特征体现为福祉制度深度嵌入国家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各领域、各环节相融共生、不可分割。这种结构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顺应国家与人民发展需要不断演进，其本质是关系结构的产物，也是持续创造福祉导向性关系的前提。与结构优化相伴随的，是社会保障等民生保障的国家治理功能的历史性变迁。在福祉中国框架下，这种功能体现为政治福祉、经济福祉与社会福祉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

理论内涵是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回应了社会保障领域“何以立足、何以发展、何以追求”的根本性理论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阐释，也是对西方福利理论的系统性超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以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变革为主线，在社会保障领域凝练形成三个具有理论张力的核心命题。三大命题彼此关联，贯穿关系变革的核心逻辑，明确了福祉中国建设的理论遵循、政治保障与价值追求。

（一）“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创新：福利理论的中国化建构与西方范式超越

对“西方福利理论普适性”的解构与中国自主福利理论的建构，构成了本命题的核心理论张力，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下福利理论的路径依赖。“两个结合”并非简单的理论叠加，而是从方法论层面为中国社会保障理论划定了逻辑起点与发展边界，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实现福利理论的中国化创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保障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社会保障关系的适应性、辩证性变革，破解了西方福利理论“经济决定福利”的单向度逻辑。新中国成立初期，适配计划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变革旧中国剥削性的社会保障关系，建立单位保障体系，完成了国家与人民保障关系的初步重构；改革开放后，顺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推动社会保障从“单位化”向“社会化”转型，重新界定政府、市场、企业、个人的责任关系，实现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结合进入深化阶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以脱贫攻坚为抓手变革城乡、区域、群体间的资源分配关系，推动社会保障资源从“选择性分配”向“普惠性共享”转变；立足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就业方式多元化的新国情，结合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推进节奏，同步落地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全国推广与优化调整，让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精准适配、动态衔接。这一过程始终坚持二者辩证统一，既肯定经济发展的物

质支撑作用，又强调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反哺功能，突破了部分西方福利理论将二者对立的片面认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社会保障理论的文化赋能与价值重塑，克服了西方福利理论“个体主义”的价值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扶危济困”传统理念与社会救助制度结合，构建了城乡基本救助框架；改革开放后，“守望相助”思想融入社会保障实践，推动了慈善事业、社区互助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二者融合更为深入系统：以“民为邦本”对接人民至上理念，确立社会保障之“国家服务人民”的核心逻辑，区别于西方“国家给付、公民接受”的单向关系；以“天下大同”呼应共同富裕目标，推动社会保障从“兜底保障”向“社会发展促进”升级，构建共同体式福利共享机制；以“家国同构”思想为支撑，强化家庭在社会保障中的基础作用，推出养老托育、家庭照护支持等政策，破解西方个体主义福利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困境。

（二）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保障：整体性关系变革与西方博弈困境突破

对社会保障改革“政治主导逻辑”的建构与西方“利益博弈逻辑”的超越是本命题的理论张力所在，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保障领域关系变革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在社会保障领域的作用愈发凸显，形成了系统性、整体性的变革格局，而新中国成立后与改革开放时期的探索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全面领导确保社会保障关系变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打破西方福利改革中“资本逻辑至上”的底层束缚。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后，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方向更加明确。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核心目标，推动构建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持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通过强化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调节功能，不断统筹推进城乡、区域、群体间保障权益均等化发展，切实守护全体人民的民生福祉。从而，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福利改革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局限。

党的全面领导统筹社会保障关系变革的系统性推进，破解了西方福利制度“碎片化”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后，党统筹城乡、区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初步构建了统一的保障框架；改革开放后，协调推进市场化转型与社会保障制度创新，避免了制度断裂。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协调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通过制定统一制度框架与转移支付制度，不断缩小区域保障差距，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以破解基金区域失衡；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明确政府兜底责任与市场补充作用，推动构建多元协同的福利供给体系；在城乡关系上，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推动实现城乡权益平等化。

党的全面领导破解社会保障关系变革的利益梗阻，突破了西方福利改革“既得利益固化”的困境。改革开放后，党逐步打破计划经济时期的保障利益格局，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向公平化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深层次利益调整：打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双轨制”，推进不同职业群体保障关系公平统一；强化社保基金监管，严厉打击侵占、挪用、骗取基金等行为，维护公共利益；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保障衔接，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缩小群体利益差距。

（三）“人民”与“人”的辩证统一：从生存性给付到发展性赋能的理论跃迁

对社会保障本质内涵的重新界定与西方“生存性福利”理论的超越，构成了本命题的核心张力。“人民”与“人”的辩证统一为理论跃迁提供了关键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辩证统一在社会保障实践中充分彰显，实现了从“生存性福利给付”到“发展性福祉赋能”的质的飞跃。

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内核，融合“人民”与“具体的人”的辩证统一，推动社会保障关系的人本化变革，超越西方福利理论“资本中心主义”的价值局限。新中国成立后，聚焦人民群众基本生存需求，建立了基本养老、医疗、救助制度；改革开放后，逐步扩大保障覆盖范围，提升保障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价值内核深度落地：强调社会保障资源供给的时空一体性，统筹不同地域、不同世代人群需求，逐步锚定“具体的人”，避免抽象化与平均化；针对既有政策中忽视家庭关系、个体差异的问题，重视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支持政策，强化家庭功能，积极响应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差异化需求；建立以人民满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标准，通过“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等服务创新，让“具体的人”切实感受到保障温度。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立足“投资于人”的实践导向，推动社会保障关系的本质性变革，突破了西方“福利依赖”的理论困境。改革开放后，强化技能培训、就业扶持与社会保障的衔接，助力个体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投资于人”的导向更加鲜明：构建覆盖生命全周期的“民生七有”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与教育、就业、健康深度融合，提升个体发展能力；致力于精准化政策设计，满足不同群体的发展性需求；顺应社会关系发展趋势，以“具体的人”为中心调适当下社会关系，通过互助共济增强社会凝聚力，构建国家与人民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①让社会保障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生存性福利给付”到“发展性福祉赋能”的理论跃迁，本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两个结合”与党的全面领导支撑下，融合“人民”与“人”的辩证统一，实现的社会保障理论全方位升级。这一升级既传承了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经验，又立足新时代国情实

^① 席恒、王涵：《社会政策的维度、功能与创新路径》，《社会政策研究》2024年第6期。

现了理论创新,让社会保障成为兼具生存保障、能力提升、价值实现的综合性福祉体系,成为福祉中国建设的核心学理支撑。

四、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制度内涵

制度内涵是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骨架,回应了“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关系变革、如何以制度创新支撑福祉中国建设”的核心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以关系变革为主线、福祉中国为目标,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形成三个具有理论张力的核心命题,构成了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三大命题相互支撑,通过系统变革社会保障制度内部及与外部系统的关系,构建起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配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民生领域的独特优势。

(一) “面中有点”：普惠性与精准性的辩证统一，突破西方福利覆盖的二元困境

福利覆盖的本质是资源分配的价值取向与技术路径问题,而“面中有点”的制度逻辑通过对分配关系的重构,实现了普惠性与精准性的辩证统一,完成了从“形式公平”到“实质公平”的学理跨越。

“面”上普惠重构资源分配的价值基础,破解“福利排斥”的制度性难题。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始终受制于资本逻辑与阶级差异,形成以身份、职业、收入为边界的“选择性覆盖”格局,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往往被排除在核心福利体系之外,陷入“福利排斥”的困境。^①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以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推动系统性制度革新,打破城乡、区域、身份与职业带来的保障壁垒,推进社会保障资源从差异化配给转向全民普惠共享,致力于夯实“人人享有基本保障”的制度基础。养老保险领域构建职工与城乡居民两大制度板块,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0.7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医疗保险领域推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快速发展,整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实现13.27亿人“应保尽保”;^②社会救助领域构建城乡统筹体系,将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应救尽救”。全民覆盖的制度设计,从学理上确立了“社会保障是全体人民基本权利”的核心认知,为福祉中国奠定了普惠公平的制度基础。

“点”上着力精准优化资源配置的技术路径,弥补“面上普惠”的效能缺陷。在全民普

① R. 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53-57页。

② 新华社:《三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0.2万亿元》,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jiedu/tujie/202601/content_7056262.htm,2026年1月27日;国家医疗保障局:《2024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7/content_7031956.htm,2025年7月14日。

惠的基础上，社会保障资源向特殊群体倾斜，着力避免“富者受益、贫者不足”的逆向调节制度弊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①为原则，通过三大靶向机制实现精准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机制，将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实现“脱贫不脱保”；针对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专项保障制度，如残疾人两项补贴、高龄津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精准弥补保障短板；构建社会救助动态监测机制，通过大数据筛查、入户核查等方式精准识别困难群众，实现救助对象动态调整与需求精准匹配。这种精准化设计，从学理上构建了“需求导向”的资源分配逻辑，突破了“供给主导”的平均主义局限，促进社会保障从“兜底保障”向“精准赋能”的升级。

（二）“稳中求进”：稳定性与创新性的动态平衡，破解西方福利发展的两难悖论

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对“稳定”与“创新”关系的合理把握，西方福利国家要么因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而陷入“制度僵化”，要么因激进改革而引发“福利危机”。“稳中求进”的发展节奏通过对制度发展关系的动态调整，达成稳定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为福祉中国提供了可持续的制度支撑。

“稳”即构建保障水平与经济适配机制，规避“高福利陷阱”。西方福利国家在资本逻辑与选民诉求双重驱动下，往往脱离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承受能力，盲目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产生导致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脱节、财政压力剧增的“福利危机”风险。^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构建起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以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为约束边界，职工与城乡居民养老金稳步提升但不脱离实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提升、医保目录扩容始终坚守“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基金管理原则。这种“保基本”的制度设计，从学理上确立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核心认知，既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又为制度长期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破解了西方“高福利陷阱”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进”即建立制度稳定与创新的协同机制，突破“制度僵化”。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受制于资本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群体，制度创新动力有限，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等新挑战。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坚持与时俱进，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在保持制度稳定性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创新。这包括，养老保险领域扎实推进全国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实现全国覆盖并完成产品种类扩容、领取规则细化，养老保险多层次保障体系持续健全；医疗保险领域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② 李筠：《论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政治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1期。

深化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进一步扩围, 并完善失能评估、筹资机制等制度设计, 推进系统性破解失能人员长期护理的供给难题; 社会救助领域推进综合改革, 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 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应对突发性困难。这种“小步快跑、逐步完善”^①的创新逻辑, 从学理上构建了“实践 - 创新 - 完善”的闭环机制, 既保持制度连续性与稳定性, 又能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变化。

(三) “进中提质”: 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的同向发力, 超越西方福利升级的路径依赖

社会保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兼顾“结构合理”与“效能卓越”。“进中提质”的升级方向通过对制度结构与效能关系的系统性变革, 推动社会保障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为福祉中国提供了高质量的制度支撑。

以结构优化构建多层次协同体系, 破解“制度碎片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以系统思维为指导, 通过三维结构优化实现制度升级。优化内部结构, 构建以社会保险为主体,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补充, 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支撑的多层次体系, 形成多元协同、覆盖全面的保障格局; 完善层次结构, 在基本保障之外, 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补充保障及商业保险、慈善捐赠等机制, 构建“多支柱”体系; 强化外部衔接, 推进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制度有效衔接, 形成保障合力。这种结构优化设计, 从学理上构建了“系统协同”的理论框架, 提升了社会保障的整体性与协同性。

以效能提升激活制度运行与服务机制, 超越“重给付轻服务”。部分西方福利国家往往注重福利给付数量增长, 忽视制度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提升, 导致运行机制僵化、服务效率低下, 制度保障效益不佳。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导向, 推动治理现代化, 实现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双重提升。基金管理方面, 建立预算管理制度与多元监管体系, 确保基金安全, 推进投资运营实现从“静态保值”向“动态增值”转变; 服务管理方面, 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建立全国统一信息平台, 实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 提升服务可及性; 监督管理方面, 构建政府、社会、舆论相结合的多元监督体系, 加强政策执行、基金使用、服务提供等环节全程监督。这种效能提升设计, 实现了从“被动保障”向“主动服务”的转型, 促进社会保障资源效用最大化。

五、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内涵

实践内涵是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的血肉, 回应了“如何通过实践推进关系变革、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福祉中国建设效能”的操作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

^①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128页。

主义实践要求，以关系变革为主线、福祉中国为目标，在社会保障实践中形成三个具有理论张力的核心命题，构成了实践体系的内在逻辑。三大命题有机协同，始终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高度统一为核心实践品格，通过深化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变革，将理论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为福祉中国建设提供了可操作、可持续的实践路径。

（一）利益突破与秩序维护的协同：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践彰显

社会保障实践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深度重构，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合目的性（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与合规律性（遵循社会变革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西方福利国家在实践中往往陷入二者失衡的困境：一方面，受资本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格局掣肘，福利改革难以触及深层次利益矛盾，最终因背离公平正义的合目的性而陷入停滞；另一方面，部分国家试图通过激进变革打破僵局，却因违背渐进式变革的合规律性，引发社会秩序动荡与民众抵触。相对而言，中国社会保障实践精准把握利益调整的价值导向与演进规律，实现了利益突破与秩序维护的动态平衡。

以人民利益为合目的性内核，突破不合理利益格局。社会保障的本质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这一合目的性在实践中体现为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利益代言的执政党，能够超越局部利益羁绊，推进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重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利益分配机制，推动不同职业群体保障权益的公平对等，实现制度层面的公平统一；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突破二元结构下的利益割裂，让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保障权益；强化社保基金监管，以“零容忍”态度打击侵占、挪用等行为，维护基金的公共属性与人民利益；通过社会保障强化再分配功能，缩小群体间利益差距，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一实践逻辑始终紧扣“增进人民福祉”的核心目的，区别于西方福利国家以“维稳”为初衷、服务资本利益的实践导向。

以循序变革为合规律性遵循，筑牢社会秩序稳定根基。社会保障变革涉及面广、关联性强，其发展具有渐进式演进的内在规律，违背规律的激进变革必然引发动荡。中国社会保障实践严格遵循这一规律，坚持“试点先行—经验积累—全面推广”的循序推进策略，实现变革力度、发展速度与社会可承受度的有机统一。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养老金等重大改革先经局部试点验证可行性，并在试点扩围中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的实施路径，避免“一刀切”带来的实践偏差；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医保报销比例提升等政策，始终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按群众接受程度稳步推进，让改革成果平稳落地；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社会救助综合改革等举措时，同步完善财政补助、部门协同等配套政策，形成改革合力。这种循序渐进的实践路径，既保证了利益调整的深度，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破解了西方福利国家“要么停滞要么动荡”的两难困境。

（二）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闭环：价值导向与实践效能的统一

政策是关系变革的核心载体，其实践效能取决于合目的性（价值导向）与合规律性（执行逻辑）的贯通程度。中国社会保障实践通过推动构建“科学民主制定—精准高效执行”的闭环机制，不断实现价值导向与实践效能的统一，彰显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协同。

科学民主的政策制定，坚守合目的性的价值根基。政策制定的合目的性体现为以人民需求为导向，这一价值导向通过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落地。调研环节深入基层梳理实践难题与群众诉求，确保政策立足实际、贴合民意；论证环节吸纳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群众代表多元参与，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兼顾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提升政策科学性与可行性；公开环节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稿等形式广泛吸纳社会反馈，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让政策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合法化环节通过法定程序固化政策内容，确保政策的权威性与稳定性。这一决策机制始终围绕“增进人民福祉”的核心目的，突破了西方福利国家政策制定中资本利益主导的局限，从源头确保了政策的合目的性。

精准高效的政策执行，遵循合规律性的实践逻辑。政策执行的合规律性体现为遵循“精准适配、全程可控”的实践要求，中国社会保障实践构建了完善的执行体系：主体层面明确各级政府与部门的职责分工，形成“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的责任网络；方式层面立足地区发展差异与群体需求分化，采取差异化、精准化措施，实现“精准滴灌”，确保政策惠及每一个符合条件的群众；监督层面建立常态化、全过程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执行偏差，确保政策不跑偏、不走样；评估层面构建以人民满意为核心的成效评估体系，根据评估结果动态优化政策，形成“制定—执行—评估—优化”的闭环。这一执行体系严格遵循政策落地的实践规律，将政策的价值导向转化为实践效能。

（三）风险应对与改革的协同：动态适配与制度韧性的提升

现代社会的风险复杂性对社会保障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核心是实现合目的性（风险防控为民）与合规律性（制度创新适配发展）的统一。西方福利国家因利益格局固化，在人口老龄化、公共卫生危机等风险应对与制度创新中陷入割裂困境，最终背离了风险防控的民生导向；因缺乏创新动力，制度难以适配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违背了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最终导致实践停滞。中国社会保障实践通过“主动风险防控—持续改革创新”的动态协同，实现了动态适配与制度韧性的双重提升。

主动风险防控，坚守合目的性的民生底线。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稳定器”，其合目的性核心体现为向人民群众抵御风险提供坚实保障。中国社会保障实践构建了“主动防范、精准化解”的风险治理体系。针对人口老龄化加速风险，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养老服务供给，筑牢“老有所养”防线；针对公共卫生危机冲击，健全重大疫情医

疗救治费用保障机制、扩大医保报销范围、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强化“病有所医”能力；通过社会救助动态监测、精准帮扶困难群体、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守住“弱有所扶”底线。这一风险治理体系始终围绕“保障人民权益”的核心目的，突破了西方福利国家风险应对中资本利益优先的局限。

持续改革创新，遵循合规律性的发展逻辑。社会保障制度的合规律性体现为随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演进，中国社会保障实践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题－实践检验”的逻辑，在应对风险中推进制度创新。面对灵活就业群体参保难、保障衔接不畅问题，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缴费与转移接续政策，实现社保跨省转移接续“一网通办”全覆盖，破除就业形态与参保身份的壁垒，扩大制度覆盖的包容性；面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保障短板，健全分层分类的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完善精准识别与动态帮扶机制，夯实未成年人成长的民生底线；面对城乡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不均、供给能力不足问题，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民生保障应急响应不足问题，建立社会保障应急保障机制，完善临时救助、物资保障与服务供给的快速联动模式，提升制度的应急适配能力。这一创新逻辑遵循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既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又通过创新回应实践需求，突破了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僵化的路径依赖。

风险应对与改革创新的动态协同，本质上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深度融合。风险应对坚守“为民保障”的核心目的，为改革创新指明方向；改革创新遵循“适配发展”的内在规律，为风险应对提供支撑。这种协同逻辑突破了西方福利国家“风险应对”与“改革创新”相互割裂的实践范式，实现了“在防控风险中深化变革、在改革创新中防控风险”的良性互动，让社会保障制度始终保持适应性与韧性，为福祉中国建设提供了持续的实践动力。

六、中国自主性社会保障知识体系的世界贡献

从人类社会发展与现代福利文明演进的大历史视野看，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始终与各国制度属性、历史传统、发展阶段深度绑定。中国以福祉中国为标识、以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变革为主线，构建起具有中国自主性的社会保障知识体系，为全球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发展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制度参考与实践意义的中国方案。

在理论层面，该体系在批判性吸收西方福利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为全球社会保障理论发展贡献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质与实践根基的学理框架。西方福利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语境，是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探索民生保障的重要成果，其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福利供给机制的设计，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推动了人类福利文明的

早期进步。但受制于资本逻辑与个体主义价值导向,西方福利理论逐渐形成“经济决定福利”“资本主导福利”“单向给付福利”的理论定式,难以调和资本与劳动的根本矛盾,也无法回应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需求。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确立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构建起集体主义与个体发展相统一的福利认知。同时,该体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形成从“生存性福利给付”到“发展性福祉赋能”的理论跃迁。

在制度层面,该体系创造了适配后发国家发展实际的社会保障制度范式,为各国破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难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实践参照。西方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依托其工业化、现代化的先发优势,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全球化推广提供了早期范本。但西方福利体制存在的僵化性、不可持续性等固有缺陷,使其难以成为后发国家直接套用的范本,部分国家盲目模仿更是陷入“高福利陷阱”或“福利排斥”的双重困境。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立足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与中国发展实际,凝练出“面中有点、稳中求进、进中提质”的制度逻辑,实现了普惠与精准、稳定与创新、规模与质量的动态平衡,构建起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配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一制度范式既坚守“保基本、兜底线”的务实原则,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协同性,又注重制度的系统性与包容性,能够适配不同发展阶段的民生需求。

在实践层面,该体系探索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路径,为全球社会保障实践落地探索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西方福利模式曾凭借成熟的制度体系与福利供给能力,为民众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保障,但受制于既得利益格局、资本逻辑束缚,其在风险应对与改革创新中逐渐陷入被动,难以实现福利制度的可持续转型。中国社会保障自主知识体系将理论与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走出了一条立足发展阶段、回应民生需求、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实践道路。在实践中,中国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改革策略,降低制度变革的社会风险,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稳迭代;构建起主动防控、精准应对的风险治理体系,在人口老龄化、公共卫生危机等挑战中展现出强大的制度韧性。这一系列实践经验为全球社会保障实践从“被动给付”向“主动赋能”、从“静态稳定”向“动态适配”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事业仍处于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仍需进一步优化,以应对在区域均衡发展、制度质量提升、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挑战。但其中蕴含的对中国民生保障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政策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与具有鲜明自主性的社会保障知识体系框架已然成形。在大历史观下,它证明了西方社会保障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各国应立足自身制度属性、历史传统与发展阶段,探索适合自身的社会保障道路,为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社会保障体系注入强大动力。

The Triple Connotations and Global Contributions of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Jia Yujiao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has broken free from the cognitive constraints of Western-centrism and, grounded in it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forged a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 path distinct from that of Western welfare states. In doing so, it has established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ed an autonomous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with rich connotations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As the practical manifestation and theoretical hallmark of this knowledge system, "Well-being China"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welfare models dominated by Western capital logic and traditional forms of social protection, and embodies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imed at 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in China. Ta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as its main thread and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its ultimate goal, this framework,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relies on the "Two Integrations" to realise the Sinicisation and innovation of welfare theory, establishe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holistic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and accomplishes a theoretical leap from survival-oriented welfare provision to development-oriented well-being empowerment.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rough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mbining focal breakthroughs with broad-based coverage, pursu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improving 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progress, it has built a multi-tier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uited to Chinese modernisation.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translates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strengths into practical efficacy through the threefold synergy of overcoming vested-interest barriers and maintaining orde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risk response and reform innovation. In doing so, it not only underpins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Keywords: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ll-being China;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责任编辑: 郭林)